

博物館與文化 第3期 頁3~28 (2012年6月)

Journal of Museum & Culture 3 : 3~28 (June, 2012)

離散的收藏與拼接的記憶：
從臺灣原住民藏品跨國連結的二個例子談起¹

胡家瑜²

Dispersed Collections and Articulated Memories:
Two Cases of Making Transnational Linkages to Taiwan
Indigenous Collections

Chia-Yu Hu

關鍵詞：離散、民族學藏品、跨界流動、權力關係、記憶政治

Keywords: Disperse, Ethnographic Collection, Cross-Boundary Movement,
Power Relation, Memory Politics

¹ 本文初稿發表於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2009 年 11 月 4 日舉辦「人類學與人群的遷徙與重構—人類學藏品、大學博物館與社區」研討會。修改過程中感謝許湘彩和陳怡君小姐協助校正和補充資料，以及二位審查人提供的修正意見。

²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chiayuhu@ntu.edu.tw

(投稿日期：2012 年 4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2 年 5 月 14 日)

摘要

本文主要從物質和記憶持續延伸的角度，檢視民族學藏品的流動生命史，並探討其中涉及的權力運作、離散特質、記憶的分歧、再現政治的矛盾，以及過去資源的當代多元意義。根據粗略的估計，全世界大約有 500 萬件以上的民族學藏品，分散於世界各地超過約 900 間的博物館和收藏機構；其中與臺灣有關的民族學藏品至少超過上萬件。民族學的調查採集和專業博物館的設立，主要是 19 世紀中葉以後在歐美社會興起並向外蔓延。這些藏品資料雖然主要是作為民族科學研究的標本和物證，但是其採集移動過程大多與帝國和殖民主義密切勾連，無可避免地蘊含了權力關係不平等，以及社會文化脈絡斷裂和離散的性質。21 世紀的今天，民族學藏品脈絡的重新連結，以及權力關係的平衡轉換，將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和重要課題。因此，本文將透過二個臺灣民族學藏品跨國流動例子，檢視其中複雜交錯的帝國或殖民力量影響、藏品延伸的物質和影像生命，以及文化圖像再現涉及的記憶政治和多元認同等問題；希望藉此能夠理解過去學術資源與當代地方動能的關係，並且進一步思考民族學藏品與原本文物來源社會建立新連結的可能模式。

Abstract

Focusing on tangible objects and memor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dynamic life history of ethnographic collections, as well as to explore the embedded powers and dispersing essences evolving in the trajectory of object movements. According to a rough estimation, there are over 500 million ethnographic objects moving across cultural boundaries and spreading into about 900 museums or institut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ethnographic collections and museums emerged and develop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19th century. Many cultural artifacts were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and used as specimens for the newly developed science of ethnology.

The operations of cross cultural collecting were inseparable from the imperial and colonial projects. Thus, these objects inevitably reflect imbalanced power relations and display ruptured features. However, reconnecting objects with their original contexts and counter acting power relations ar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21st century. Based on two cases of transnational movement of Taiwan indigenous collect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xtended material life of ethnographic collections, the entangled imperial and colonial forces, and the related issues of memory politics and divergent identities. Finally, it seeks to examine the possibilities and complications of reconstructing transnational linkages between museum collections and the contemporary local agencies.

前言

2009年10月中旬，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³的分支機構—國際民族學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useums of Ethnology, ICME)在漢城以「和解與和平的博物館：世界民族學博物館的角色」(Museums for Reconciliation and Peace: Roles of Ethnographic Museums in the World)為主題召開年會，邀請世界各國相關博物館研究者進行交流討論。出現這樣的國際會議主題，並非表示民族學博物館特別愛好世界和平，反而是突顯各地的民族學博物館，背後隱含著許多未解的衝突和矛盾。

回顧19世紀以來民族學藏品和民族學博物館成長的歷史，可以看見二種不同動力的糾纏和拉扯。一種是科學知識追求和專業化的動力；隨著19世紀中葉科學的民族學研究在歐美社會的興起，採集世界各地的異文化器物，成為研究者瞭解不同社會文化特性的主要材料。然而，學科發展的同時並行著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動力，那就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擴張的力量；到蠻荒社會探險、調查和文物採集，當時是強權國家的特殊權力和文化現象。也因為如此，民族學藏品是蘊含複雜人際互動關係的標本和科學研究的資料；其中涉及物質採集流動的歷史、不平等的權力運作，以及文化圖像挪用與詮釋再現的矛盾等。

從19世紀開始的民族學收藏風潮，至1960年代逐漸停頓為止，造成數百萬件文物資料，脫離原有的社會生活脈絡，流動至民族學博物館和收藏機構。根據粗略的推算，輾轉流動至世界各個相關收藏機構的民族學藏品，總數大約超過450萬件以上(Sturtevant, 1966)。根據國際民族學博物館協會資料庫的統計，目前登記有案的民族學相關博物館已有866間，其中還未包括許多沒有登錄的博物館。整體而言，大部分歷史悠久與規模雄偉的民族學博物館都位於歐美都會地區，它們匯集大量來自全球各地的民族學藏品，成為展示世界文化的櫥窗。民族學收藏反映的特殊物質流動模式和現象，正是帝

³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useums，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之下的機構。

國和殖民擴張軌跡的對照。

另一方面，原本標榜著為科學研究目的而採集的民族學藏品，實際上卻並不見得真正達到原有的理想。根據估計，世界各地博物館或收藏機構的民族學藏品，真正曾經被研究過的比例，可能並未超過百分之十(Furst, 1989)。造成民族學藏品研究障礙的原因很多，除了藏品數量太大，研究人力無法負擔之外，許多標本的採集記錄缺漏不足，難以追溯原有歷史文化訊息，都是造成後續研究問題的重要因素。1980年代以後，受到人類學反省思潮的影響，民族學博物館和民族學藏品的矛盾性，成為質疑和批評的重點。一些思考敏銳的學者，不但開始細緻檢視收藏的歷史過程和權力運作，也對藏品資料散失與脈絡斷裂問題，積極尋求可能的改善方式(Ames, 1992; Clifford, 1988; Bouquet, 2001)。此外，有關民族學藏品的詮釋再現觀點、展示應用方式，以及對來源社群的賦權和認同等議題，晚近都成為熱烈討論的範疇(Tunbridge & Ashworth, 1996; Shelton, 1997; Boswell & Evans, 1999; Hallam, 2000)。

台灣民族學藏品流動的軌跡，無疑也是區域歷史和人群複雜互動的結果。不少採集自臺灣的民族學標本，隨著殖民、帝國和科學主義在世界糾纏蔓延發展的過程，而輾轉跨越國界飄洋過海，最後匯集到日本或歐美等都會地區的民族學博物館⁴。基本上，這些藏品跨國移動的方向，大多直接或間接地受到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西方帝國或日本殖民勢力的牽引。

當然，藏品採集流動管道和取得方式可能非常錯綜複雜而且多元；其中或許經常籠罩著帝國霸權或殖民權威的陰影，但是卻不見得涉及非法或直接暴力。博物館研究者 Peter ter Keurs 曾經將民族學藏品的取得和採集，大致歸納為五種方式：(1) 科學探險調查；(2) 個人採集，如傳教士、領事官員

⁴ 日本和歐美收藏較多台灣民族學藏品的機構主要有：日本大阪民族學博物館、天理大學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大學總合博物館、東京外國語大學博物館；加拿大渥太華皇家博物館；英國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比德瑞佛斯博物館、劍橋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法國人類博物館、德國柏林民族學博物館、奧地利維也納民族學博物館、萊登大學民族學博物館等。

和其他旅行者；(3)殖民博覽會；(4)戰爭掠奪；(5)禮物或小規模購買(Keurs, 1999: 69)。臺灣民族學調查採集與藏品跨國流動，大致也和這些因素有關。本文主要將藉由二個具體的案例，來檢視不同時空脈絡下臺灣民族學藏品的跨國互動。這二個案例，一個是殖民博覽會的例子，另一個則是科學調查的例子；前者是與1910年在倫敦舉辦的日英博覽會台灣展示有關，後者則與1936年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的民族學調查研究有關。藉由這二個案例的分析，一方面可以探討臺灣原住民藏品資料的不同採集動力和流動軌跡；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理解舊藏品對當代不同人群而言隱含的意義差異。總之，本文希望藉此具體呈現臺灣民族學藏品背後糾結的複雜力量，並且深入思考藏品的離散特質，以及藏品作為過去資源在當代所涉及的記憶政治關連。

帝國博覽會的延伸：再現與記憶政治

關於殖民博覽會與台灣原住民物質文化採集和圖像挪用的歷史過程，筆者曾經在2005年一篇論文中提出討論，本文不再贅述⁵。總體而言，日本殖民臺灣期間曾經多次參與或舉辦博覽會，作為一種帝國統治和宣傳技術。本文將以其中一次的國際博覽會——也就是1910年日本與英國在倫敦舉辦的日英博覽會(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做為本文討論的重點。1910年代日英博覽會的規模相當盛大，顯現出日本帝國試圖躍上世界舞台與大英帝國或西方強權國家並駕齊驅的野心，並且運作為宣傳日本的文明和現代化的展示櫥窗。因此，日本針對此次博覽會投入的人力、財力和物力，遠超過其他博覽會。當時日本的展覽委員會總督和田彥次郎(Hikojiro Wada)在接受倫敦《泰晤士報》採訪時表示，這次博覽會不但具有商業價值，獲得許多有用的貿易知識，有助於打開許多歐洲新市場；也明顯具有政治和外交作用，增進了東、西方二大文明國家的互相認識和友好關係(*The Times*, 1910, Nov 2)。

⁵ 參見胡家瑜，2005。

當時的博覽會場，不但設置有許多日本和英國的工商產業、藝術和文化生活展示館，日本還針對當時其殖民勢力控制的四個地區—台灣、韓國、關東和南滿，各設置一個展示廳。其中的「台灣廳」，是由臺灣總督府負責安排展出台灣代表性產物如茶葉、樟腦、米、糖等，同時還有一些原住民的物質文化標本和模型，以此對比說明日本統治後帶給臺灣的現代化和進步。除了「台灣廳」的靜態展覽之外，會場另外設有一間將近 1300 坪有真人居住展演的「福爾摩沙土著村」⁶。台灣總督府與英國博覽會籌辦公司的娛樂部簽約，由日本警察帶著 24 位南部排灣族人（男 21 人、女 3 人），飄洋過海到倫敦會場的土著村居住展演（圖 1、圖 2）⁷。根據報紙記載，會場的「福爾摩沙村」是以「臺灣生蕃監督事務局」為中心，周邊有十二戶蕃屋，每戶有兩位穿著盛裝的排灣人，從上午 11 點到下午 10 點 20 分左右，一直坐在屋



圖 1 二十四名排灣原住民與二名日本警官出發前往倫敦參加日英博覽會前攝於臺灣(Ishii, 1916)

⁶ 會場另外還設有「愛奴村」和「日本民俗村」，也都曾運用真人展演的的方式。參考 Commission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1911。

⁷ 根據臺灣總督府資料顯示，1910 年 2 月下旬，由大島民政長官與日英博覽會餘興部企業集團代表人 Julian Hick 簽訂了原住民表演合約，內容包括：原住民在指定之場所或建物內向公眾表演生活狀態，但參加舞蹈及各種遊行與否則任原住民之意。原住民自故鄉出發至回鄉之期間，應每日支付日幣一元。承辦者需負擔往返旅費及生活所需。後來總督府派通曉排灣語而暫時停職之警部補石川種象及巡查板倉重太郎帶領高士佛社等八社的 21 名男性、3 名女性，共 24 名排灣人，啟程赴博覽會會場倫敦；參考（陳金田譯，1998：28；1999：153-156）。

內讓觀眾參觀；參觀者需要花 6 便士買門票入村觀賞臺灣「土著」村民。由於來自台灣的「土著」非常活潑，常常喜歡用剛學會的英語向參觀者打招呼，因此展覽期間很受歡迎，是觀眾人數最多的地方之一⁸。當時前往英國參加博覽會的 24 位恆春地區原住民，到倫敦會場居住半年，加上來回海上漫長的旅程顛簸，總計經過一年多時間才回到家鄉。

然而，這一段跨文化遭遇的歷史過程，並未隨著博覽會的結束而煙消雲散。當年臺灣總督府爲了博覽會而採集或製作的許多展覽品和商品，展出結束之後並未運回臺灣，而是捐贈給了英國當地不同的博物館和收藏機構。與這一次博覽會相關的不同類型臺灣展覽品，因此流離失散成爲不同機構的收藏品，深鎖在異國的庫房中，長達百年的時間幾乎無人問津。直到近十年間，因爲臺灣數位典藏計畫的推展，筆者開始進行海外台灣民族學藏品的調查研究和數位資料建置工作，流離散落在不同博物館的日英博覽會台灣藏品才被串連起來重新檢視，並且進一步調查彙整補充相關收藏歷史和文化脈絡資料⁹。



圖 2 十二名排灣男子與一名日本官員攝於倫敦日英博覽會場 (Commission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1911)

⁸ 參考鈴木作太郎，1932：374；《臺灣日日新報》，1910，9月29-30日；胡家瑜，2005。

⁹ 筆者自 2002 年起，開始陸續進行英國博物館臺灣民族學調查研究和資料彙整，期間受到英國倫敦大學大學院、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以及國科會數位典藏海外推展暨國際合作網路推動計畫補助研究經費，特此致謝。

目前可知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收藏了將近 210 件當時日英博覽會的臺灣文物，其中絕大部分是原住民織布和服飾、日常生活用具、生產工具和製造工具等文物；包括苧麻織花布塊、珠衣、長衣、短衣、披風、腰帶、帽飾、珠鍊頸飾、煙斗、竹籃、打火具、鹽筒等。根據該館的入藏記錄，這一批臺灣文物是由台灣總督府的官員 T. Kawada 和英國娛樂公司 Nosawa & Co Broad Sheet Goure 所捐贈。另外，牛津大學比德瑞佛斯博物館(Pitt-Rivers Museum, Oxford University)藏有 Henry Balfour¹⁰捐贈的博覽會臺灣原住民明信片 12 張；劍橋大學考古人類學博物館(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也藏有日英博覽會臺灣原住民明信片 8 張；倫敦皇家植物園(Kew Royal Botanic Gardens)則輾轉取得博覽會展出的臺灣植物纖維製品和商品標本約 30 件。

前面提到日英博覽會籌辦公司娛樂部曾經透過臺灣總督府，安排了 24 位高士佛等社的排灣族男女，從台灣到倫敦會場設置的福爾摩沙村居住展演半年。他們在會場活動的身影，被拍攝製成明信片商品販賣。透過目前保留在牛津大學比德瑞佛斯博物館和劍橋大學考古人類學博物館收藏的共 20 張明信片，我們可以清楚看見 1910 年到倫敦博覽會參與展出 24 位原住民當中 15 人（男 13 人、女 2 人）的容貌與名字；其中包括頭目 *Tugie Kalowan*、*Rugayo (Lungaya)*、*Buchaburi Salangai (Rechabury)*、*Cavaji Cojun*、*Jubo Bikap*、*Bachago Bagaban*、*Pasagolon Radalan*、*Api Patogaton*、*Pasuriba Kojugi*、*Pitaraji Chokarn*、*Togachoi Rumuchi*、*Chaibai Pujajon*、*Dajibaka Sapai*、*Tajubakan Sapai*、*Jajakaru Jalan* 等人。明信片中的福爾摩沙村原住民，都穿著盛裝配戴飾物，男子手持刀、火繩槍或弓，或站、或蹲、或跪在展場現身。在〈博覽會與臺灣原住民—殖民時期的展示政治與「他者」意象〉（胡家瑜，2005）一文中，曾經提到當年的報紙出現過一則消息，報導 1910 年 9 月 3 日博覽會場福爾摩沙村舉行的一場排灣婚禮，新娘是 21 歲的

¹⁰ Henry Balfour 是牛津大學比德瑞佛斯博物館的首任研究員，也是早期英國著名人類學家，著有 *The Evolution of Decorative Art* (1893) 等書。

“*Rungayo*”，新郎是 24 歲的“*Butsuaberi*”。當時新娘已經懷孕待產；不久之後，新娘在會場產下一名新生兒，命名為“*Hitehiro*”（就是「英博」的意思）¹¹。巧合的是，當年在會場結婚的二名新人，他們的身影也凝結在牛津和劍橋博物館收藏的明信片。

至於當年到英國倫敦參加博覽會的臺灣原住民，究竟對於展示安排有什麼想法？從現今留下的日本相關記錄資料來看，大都是正面的。例如，有的記錄提到參展者被問及客遊倫敦的感想時說道：「倫敦市街的壯麗廣闊，工商業品的精巧，機器機關的雄偉，人馬物貨的往來交織頻繁，以及金銀財物的流通可能是台北的幾十、幾百倍。為什麼台北蕃務本署的廳舍那麼矮陋，卻沒有改建新的呢？」（鈴木作太郎，1932：378）；也有資料提及一名叫 *Tipo Sarogai* 的排灣人，返國後在宴會公開致詞時說：「未離開這裡之前和到了英國之後，我們的想法完全改變了。我想，在世界上再沒有像我們這麼野蠻的種族了。我們應該立即脫離這些野蠻的習俗。要想脫離這些習慣，當然必須依靠學問的力量。今後，我們會努力地教育子弟逐漸進步到開明的階段。希望以後能夠有人能到英國留學，希望以後我們也能過著和世界其他人一樣的生活。」（*Ishii*, 1916: 18-19; 鈴木作太郎，1932：375）。

但是，當時日本官員或記者的報導，是否能真正反映參加日英博覽會展出原住民的真正心聲？我們可能必須合理的存疑。相較之下，現今部落內部對於一百年前先人曾經到倫敦參加博覽會的記憶並不普遍也不清楚。當年參加博覽會展出的 15 名原住民人物影像資料雖然保存下來，同時還有個別人物的名字記載，不過經過一百年的時間洗禮，當年的參與者早已過世，而且部落歷經多次遷徙離散；因此，現今僅有少數老人記得曾經聽說祖輩親戚到國外參加展覽的往事，而且大都只有模糊的印象而很難具體敘述細節¹²。

¹¹ 相關報導見 *The London Times*, 1910, Sep 9; 伊能嘉矩，1910：125。

¹² 筆者曾於 2006 年將相關影像帶回屏東高士村—高士佛社人現今主要的聚居處，希望耆老們能夠辨識明信片中的人物，回想起過去哪些人去倫敦參與展覽，以及當年參展者的經歷和生活記憶。由於照片人物面貌的辨識，不見得能在短時間內回想起；因此後來這些影像資料留下一份拷貝放在當地部落發展協會，作為後續地方歷史追溯和詮釋運用的資源。

然而，留存下來的具體物證和資料遺留，在當代的意義卻不僅是客觀的資料。對於這些資料，不同群體可以各有其詮釋的角度和再現的立場。2009年，為了紀念日本開國一百五十周年，日本朝日電視台(NHK)規劃製作四集名為《日本登場》的特別節目。2009年4月5日播放了第一集，片名為《亞洲的一等國》，片中對於日英博覽會的詮釋和再現，以及後續引發的記憶政治效應，非常值得深思。這部影片主要以日本殖民臺灣為主題，試圖以反省和批判的手法，檢討日本開放和現代化之路的軌跡。導演主要運用二個軸線和二張照片，呈現日本在臺灣殖民時對待台灣人民的強勢作為和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一個是台北知識菁英對日本時代的生活回憶，一個就是將台灣原住民帶到倫敦日英博覽會參展的事件。影片中運用的二張照片，一張是台北第一中學（建國中學）的學生團體照；另一張就是當年臺灣原住民赴倫敦參加博覽會的照片（圖2）。在呈現這張到倫敦參加1910年日英博覽會展演的臺灣原住民合照時，引用了「人間動物園」一詞，形容當時會場中福爾摩沙土著村的臺灣原住民展示。

雖然製作單位在拍攝期間為了嘗試瞭解不同角度的想法，曾經派人到臺灣尋找當年參展原住民的後裔，也派人到英國牛津大學博物館拜訪影像資料的收藏管理者。但是，這部具有批判精神的影片，播出後仍然因為詮釋再現的角度和記憶的矛盾性，在日本引發軒然大波，並且在臺灣造成多方撻伐。許多日本右派團體激烈抗議，認為這是「扭曲歷史」。不少台灣人和社團，也批評影片呈現的是自虐史觀，破壞了台日關係和台灣獨立運動者的情感。更嚴重的是，影片中受訪的排灣族人，後來接受日本另一台記者訪問時，對於影片的詮釋結果也表達不滿，認為影片並沒有忠實地呈現他們完整的說法，只擷取了負面的敘述，表達的主要是前人被帶到遠地異國參加博覽會可憐和悲哀的記憶；但卻完全沒有納入他們所講的正面說詞，因為有人提到出國參加博覽會的親人回國之後覺得大開眼界，而且存了不少錢，也學會說幾句英文向村人表現。

影片中使用的「人間動物園」一詞尤其受到非常激烈和嚴厲批評，因為

這個詞彙並非當時日本政府所使用的詞彙，而是節目製作單位採用法國殖民歷史研究者的說法而添加的詮釋。很多人認為這種說法將原住民參加博覽會展示，比擬為動物園的動物表演，是對台灣原住民的另一次嚴重傷害。南台灣的原住民團體也站出來反駁，認為他們的祖先當時自己願意出外旅行或到博覽會參加展演，因為當時是大開眼界的機會，而不是像動物般被人戲耍。當然，另一方面，這一部影片也出現不少熱情的支持者，不少反日情結和統一傾向強烈的觀眾，在網路上熱烈地貼文回應，認為殖民時期的照片影像，是事實確鑿的具體歷史記錄，讓人印象深刻，可以打破大家對舊日本帝國的美好幻想。

這一次影片事件的爭議和衝擊在日本蔓延了幾個月，也引發出訴訟事件。影片製作群和導演對於片中批判殖民和自我反省觀點所帶來的糾紛相當苦惱，尤其不能理解採用「人間動物園」一詞註解殖民博覽會的舊照片，為何反而會引起臺灣人和原住民如此強烈的反彈¹³。這個事件以非常戲劇化的方式，顯現了過去資料的典藏、再現和記憶政治的多元複雜性，以及無可逃避的當代對話關係。日英博覽會資料的聚集和離散，涉及日本帝國、大英帝國和台灣原住民的交錯互動歷史；究竟應該如何呈現和詮釋這些失散的過去資料，其實並沒有標準答案。但必須小心的是，實體證據所呈現的，並不一定不是過去或歷史的真實；不同權力和利益關係者，因為不同的目的，在不同情境之下以不同的方式敘說或解讀，都會反射出記憶的差異。

從這個角度來看，NHK 影片中對於日英博覽會和臺灣原住民的再現，雖然並無惡意，但因為主要是從日本的反省思考出發，對於當代台灣社會或原住民情感可能造成什麼影響，並沒有細緻的理解和考慮。透過這個案例可以提醒我們，過去具體物證具有的召喚記憶力量、記憶本身流動可塑的性

¹³ NHK 製作節目之時，2008 年 10 月中旬曾由台北派駐人員與請筆者聯絡，希望能夠提供日英博覽會的影像資料作為節目部研究參考。由於當時對影片會如何使用影像有所疑慮，筆者希望 NHK 能尊重原住民自我的發聲權，因此建議節目製作者前往屏東高士村訪問當地人的意見。結果節目播出後造成如此大的爭議，NHK 製作群相當困擾，因此於 2009 年 7 月中旬與筆者會面，希望進一步瞭解關於日英博覽會詮釋和再現的問題。

質，以及記憶政治與當代群體認同之間的關係，都是再現過去時必須更深刻檢視和思考的問題。否則，很有可能無心之間又落入過去的窠臼，在新的時間場域再度爲了自身的目的而挪用他者的意象。

台北帝國大學的原住民調查採集：藏品資料的離散與拼接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運用國家力量在台灣推動科學研究和知識工程的機構，台北帝國大學（簡稱台北帝大，現今國立台灣大學的前身）應該是其中關鍵的一個。台北帝國大學是臺灣正式設立的第一所大學，1928 年在上山滿之進總督任內成立。根據首任大學總長（校長）幣原坦所言，大學設立的主要目的爲「利用台灣地理人文條件，發展以台灣爲中心的華南及南洋研究」（幣原坦，1938）。因此，當時設立了一些新興學科，納入西方科學強調的實證精神和調查採集研究方法；例如理農學部的「動物學科」（台大動物學系前身）、「植物學科」（台大植物學系前身）、「地質學科」（台大地質學系前身）、「農業生物學科」（台大植物病蟲害學系前身）和「林學科」（台大森林系前身），以及文政學部的「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講座）」（台大人類學系前身）和「語言學研究室」等，都強調在臺灣進行田野調查和標本資料的採集工作。

台北帝大文政學部的「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和「語言學研究室」，可說是當時最重要的臺灣原住民研究學術機構。其中，1928 年在史學科之下設立的「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是由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移川子之藏擔任講座教授。移川教授自籌建期間開始，陸續透過購買或捐贈等管道，取得許多重要私人收藏家採集的台灣民族學標本，例如伊能嘉矩、宮川次郎、宮原敦、松山虔三、尾崎秀真等人。同時，移川教授與講座助手宮本延人和學生馬淵東一，持續進行全島原住民各族群的實地田野調查，採集系譜、物質文化標本、田野影像與錄音等資料。「語言學講座」則是 1930 年設立在文學科之下，最初由小川尚義教授主持，1936 年小川退休後由淺井惠倫教授接任。這個機構以研究台灣原住民語言爲主要目標，強調採集第一手的語音、詞彙

和神話傳說等材料；因此收藏累積了許多重要的原住民語言資料手稿、錄音和影像等。

當時「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和「語言學研究室」的調查研究成果相當豐富。1930年，臺灣總督上山滿之進卸任離台前，將各界贈予的送行金捐贈給「土俗人種學講座」和「語言學研究室」，作為進行台灣原住民研究的經費。這二間機構運用這筆經費展開長期性的大規模全島調查和資料採集工作；調查研究結果，「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出版《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移川、宮本、馬淵，1935）一書，「語言學研究室」出版《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小川、淺井，1935）。這二本書分別獲得1936年的「帝國學士院賞」和「天皇恩賜賞」，對於臺灣原住民研究具有重要價值。事實上，前述二間機構有緊密的互動和合作關係，有時候還共同前往原住民部落進行調查；而且二者調查訊息或研究資料彙報，經常透過當時南方土俗學會的《南方土俗》（1936年更名為《南方民族》）期刊交流分享（胡家瑜，1996，2007）¹⁴。

雖然台北帝大的臺灣原住民研究成果，是後續進行相關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但是，當時調查採集所累積的藏品資料，卻有很長一段時間被大家冷落和淡忘。隨著人員移動、機構轉型和歷史更迭，台北帝國大學採集的原住民藏品資料，也輾轉流動離散至不同地方。1945年戰爭結束後，台北帝大改名為國立台灣大學，原本史學科的「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更名為台大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1949年「民族學研究室」移入台大新設立的考古人類學系（現更名為人類學系），原先的藏品也轉為人類學系的收藏。目前台大人類學系所保存的民族學收藏，大致包含文物標本約5800多件、田野影像約8300張、古文書約362件、錄音唱片約15張，動態影像17部，大部分是帝大時期「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收藏。

¹⁴ 這本刊物は「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移川子之藏教授，1931年邀集在台灣不同單位的民族學興趣者組成的「南方土俗學會」出版物。

另一方面，「語言學研究室」調查採集的許多語料記錄和影音資料，則隨著淺井惠倫歸國而移動到日本。淺井戰後在台留任二年，1947 年回到日本，後來在名古屋的南山大學任教，許多台灣研究資料也因而被帶到日本，保存在日本的機構中。1965 年淺井過世後，除了少部分留在南山大學人類學系，其餘大部分淺井留下的手稿檔案和影音資料由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購得，成為該所的淺井文庫收藏。這一批資料由於輾轉遷徙，多年來被大家忽略和遺忘，直到 2000 年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開始進行分析整理和數位化工作，才有比較清楚的目錄（三尾裕子，2005）。其中包含 1930 至 1940 年代小川尚義和淺井惠倫的台灣調查研究筆記、手稿和語彙集約 400 多件，採集的臺灣原住民傳說和歌謠錄音約 106 首、動態記錄片 13 卷，以及照片數千張，都是極珍貴的台灣田野資料（土田滋，2005；宮岡真央子，2005）。除此之外，淺井惠倫也收藏有臺灣文物標本約 166 件，包括噶瑪蘭、泰雅、布農、鄒族和雅美的織布、服飾和儀式用具等珍貴文物；這些文物標本在 1947 年淺井返回日本之前，輾轉賣給美國紐約自然史博物館人類學部，目前成為該館重要的臺灣藏品之一。這些文物標本的離散過程，直到最近才因海外民族學藏品調查研究與數位化計畫的進行而被發現¹⁵。

台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和「語言學研究室」採集的資料，當時主要是在科學研究的目的下，有系統地進行田野調查採集得來；因此，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和重要性。由於這些標本和資料大多是研究者實地調查的結果，因此經常附有較詳細的田野部落資訊、採集時間、地點或相關人物等收藏脈絡紀錄。而且，採集的藏品資料類型，除了文物標本或語彙資料之外，還運用了當時新興的技術和設備，拍攝大量的田野照片、錄製原語歌謠和傳說唱片，以及拍攝動態紀錄片等。但可惜的是，歷經戰亂和時空情境的流轉變化，不少具有關連性的藏品和其背景資料遺失或散逸，亟需進行彙整分析

¹⁵ 2011 年，筆者進行國科會海外民族學藏品調查研究與數位化計畫，曾前往美國紐約自然史博物館人類學部初步檢視淺井的臺灣文物藏品。

和補充田野調查，才能拼接出比較完整的歷史和社會文化脈絡。

前面提到，由於台北帝大的「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和「語言學研究室」都是以臺灣原住民為主要調查對象，許多成果一起交流分享；而且，台北帝大 1936 年設立「臺灣史料調查室」和 1943 年設立「南方人文研究所」，網羅不同學科研究者進行臺灣和南洋地區跨學科合作研究時，這二間機構的研究者也是基本成員。因此，「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和「語言學研究室」的研究者經常共同進行調查採集活動；而同一次調查採集的不同類型資料，也經常由二個機構研究者分別保存在不同地方。隨著歷史變遷和時空移轉，許多藏品資料現今分散至不同國家的收藏機構；例如臺灣大學典藏調查紀錄片，東京外國語大學則保存該次的調查錄音唱片；或是東京外國語大學保存了調查錄製的動態紀錄片，而臺灣大學卻藏有調查拍攝的田野照片等。

同一次調查活動的採集資料分別由不同機構收藏，其實是非常普遍的民族學藏品資料流動過程，許多研究者早就習以為常，透過研究交流有時可以匯集所需的資料。但是，對於藏品來源的原住民族群後裔而言，掌握流散的調查採集藏品訊息和資料卻非常不容易；但另一方面，藏品資料匯集能夠連結的地方記憶，卻具有更深刻的情感價值和歷史意義。以台北帝大 1936 年進行的賽夏巴斯達隘（矮靈祭）調查為例，可以呈現出離散各地的舊藏品資料，該文化後裔的記憶焦點，以及匯集離散藏品的多元可能。

1936 年 11 月，台北帝大曾經到新竹五峰的大隘社進行過一次賽夏巴斯達隘的祭典調查。此次調查活動，在 1937 年的《南方土俗》第四卷第三期曾經有簡短的報導。當時調查採集的資料，現今在台大人類學系保存有田野照片約 84 張，以及相當珍貴的十六釐米動態紀錄片 1 卷。對於當年為何進行該次調查活動，研究者並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錄或說明；反倒是在部落族人的記憶中，提起過這次調查對賽夏人的深遠影響。大隘社趙正貴老師從他父親 *Oebay Taro*（伊波仁太郎、趙旺華；大隘社頭目 *Taro Umao* 的次子）晚年的遺稿和部落耆老訪談中得知，1930 年代後期，日本長官曾下令要廢止賽夏族的巴斯達隘祭典，祭典主祭朱家和族人知道後一致表示要誓死反

抗。*Oebay Taro* 當時擔任新竹州巡查，經常為族人排解紛爭並為政府進行部落協調溝通工作，他將此民意反映給上級並向州知事報告。知事因此委請台北帝大的學者前往調查，由主祭、頭目和地方耆老詳細解說祭典的內容特色，*Oebay Taro* 擔任翻譯（圖 3）。調查的結果，帝大學者向知事反映：這是非常珍貴的祭典，具有地方文化特色，不可廢止。於是，知事更改命令，祭典才得以維持，不過後來因應官方要求祭典舉行時間從原來的七天改成五天。據說調查之後隔年再舉行巴斯達隘祭典時，新竹州知事赤堀鐵吉也親臨參加，族人都非常高興（趙正貴，2009）。

2007 年，台大人類學系完成這一卷巴斯達隘祭典（矮靈祭）黑白無聲紀錄片的數位化工作後，展開影片回到部落的巡迴放映之旅（胡家瑜，2009）。該次部落放映活動是首次在國家數位典藏計畫經費支持下，嘗試將大學研究機構保存的資料，主動帶回部落與族人分享。由於經過時間的洗禮，日本時代田野調查採集的影音資料，已經是當代族人難得一見的珍貴文化遺產。影片分別巡迴至賽夏人分佈的三個不同區域聚落—苗栗南庄向天湖部落、新竹五峰大隘部落和苗栗獅潭百獸部落—放映（圖 4）。部落放映活動的規劃安排



圖 3 1936 年移川子之藏教授(前排右二)至大隘社調查時與頭目 *Taro Umao*(前排右一)等人合影
(台大人類學系藏品#A3320)

，主要與各個部落的文史工作室或文物館合作；三次放映會參與的賽夏族人非常踴躍，總計超過 238 人次。映後並安排有與部落耆老座談或學童交流活動，同時也將影片光碟贈送給各個部落一份，讓地方後續能夠更自主和多元地運用這一部影片¹⁶。

有趣的是，放映後部落座談時，許多族人表示非常感動看見過去祖先的容顏如今活生生地出現在面前，尤其更加高興和驕傲能夠從 70 年前影片的祭典歌舞畫面，看見賽夏巴斯達隘祭典的過程和結構都與現今非常類似，沒有多大的差異，大家非常欣慰祖先的傳統被保存得很好。但是，各部落都有人覺得遺憾，未能在影片祭典舞蹈片段中同時聽見 70 年前老人家唱的祭歌。由於 1930 年代拍攝黑白影片的機器不能同步收音，當時的紀錄片沒有聲音，對研究者而言是理所當然；不過族人卻很在意影片中呈現過去祭典的畫面，但聽不見祭歌的聲音。因此，影片放映之後，不斷有族人詢問當年是否有進行錄音；他們非常期待能夠聽見當年祖先所唱的祭歌，更希望藉此肯定當代傳唱的祭歌確實與過去相同。換個角度來看，賽夏人關注焦點的落差，反映出祭歌是巴斯達隘祭典的精髓，也是追溯儀式歷史的重要關鍵。



圖 4 2007 年重回新竹縣五峰鄉大隘部落進行 1936 年紀錄片放映活動（2007 年攝於大隘社）

¹⁶ 此次部落放映活動受到國科會數位應用和推廣計畫的資助，相關訊息及活動紀錄建置在台大數位典藏教學資源分享網站：<http://140.112.30.236.8080/dp/>

雖然巡迴放映影片的時候，並沒有在臺大人類學系保存的藏品當中找到祭典的錄音資料；但是相關出版資料顯示，調查當時確實進行了錄音。因為 1937 年《南方土俗》期刊的田野彙報中曾經提到：「高砂族固有音樂已漸漸消失，為嘗試保存而開始錄音，台北帝大語言學研究室與土俗學研究室共同於去年底(1936)開始將熟蕃歌謠錄於十吋唱盤，共 7 枚，包含賽夏族（サイシャット）歌曲 2 張。之後預定至全島採集，也計畫將這些唱片賣給同好」（淺井惠倫，1937：56）。由此可知，台北帝大採集的賽夏歌曲，在 1936 年底錄製了 2 張十吋唱盤。然而，報導中提到的唱盤，在臺大人類學系的庫房翻箱倒櫃好多遍，卻始終無法找到。

由於部落的關注和期待，放映會結束之後，尋找失落的歌曲錄音唱盤，成為另一項新的使命。結果因緣巧合地，不久後在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研究室的淺井藏品資料目錄中，意外發現該機構收藏的淺井惠倫資料中包含了 2 片 1936 年錄製的賽夏巴斯達隘祭歌錄音（圖 5）（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2005：261）。至此才確定，1936 年台北帝國大學除了「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移川子之藏和宮本延人前往調查，留下照片和紀錄片之外，任職於「語言學講座」的淺井惠倫同時也採集了部分巴斯達隘祭歌的錄音。由於當年錄影時無法進行同步收音，因此錄影和錄音由二個單位的調查研究者分開進行。後來隨著戰爭動亂和人事變遷，同一次祭典調查的紀錄片和聲音，分別被保存在台北和東京的收藏機構，而且逐漸被大家遺忘。

淺井惠倫在 1936 年採錄而後流散至海外的賽夏巴斯達隘祭歌錄音，後來經收藏單位的同意，由臺大人類學系申請一份複製數位檔，帶回部落交由賽夏人解讀。其中一段祭歌並與當年宮本延人拍攝的 20 分鐘影片結合，作為影片的背景音樂，以《巴斯達隘：1936 年的賽夏祭典》為標題，2011 年正式由臺灣大學出版社出版（胡家瑜，2011）（圖 6）。透過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看見七十多年前賽夏祭典影音資料採集和再現的曲折過程。難得的是，拼接和串連離散在台北和東京二地的賽夏儀式影音資料，成為接續和延伸藏品生命的一種行動；不僅豐富了學術研究資料，也填補和滿足了地方記

憶的缺憾。換言之，離散保存在不同機構但具有相同採集脈絡的民族學藏品資料，雖然各自有其生命歷史，也分別具有收藏研究價值，但是對於資料來源的文化傳承者而言，它們蘊含的祖先關連和過去記憶卻經常是無法切割的。透過這些跨越時空和文化邊界保存下來的珍貴影音資料，可以讓人再次省思物質和文化的生命力。

RakTs	C11-02-A	トナ 歌 出草歌 3 pkrigan	最後の方、不良
RakTs	C11-02-B	トナ 歌 出草 4	
Sai	A-8-A	(17) パスタアイの唄 (1) 新竹州竹東郡大隘社	1 ~ 16 14.7
Sai	A-8-B	(18) パスタアイの唄 (2)	おそろく 1936 年未録音 54. 浅井 1937
Sar	C02-05-A	No.5 四社 伝説 イヨホ	
Sar	C02-05-B	No.5 四社 伝説 イヨホ	
Sar	C03-04-A	6-A No.5 四社 傳説 イヨホ	
Sar	C03-04-B	6-B No.5 四社 傳説 イヨホ	
Sar	C02-03-A	No.7 四社 単語 (身体)	傳説?
Sar	C02-03-B	No.7 四社 単語 会話 ipho pari	単語
Sar	C02-04-A	No.8 四社 祭の歌 (A)	
Sar	C02-04-B	No.8 四社 祭の歌 (B)	
Sar	C10-14-A	19-A 四社話 伝説 (14ゾク 28話)	
Sar	C10-14-B	19-B 四社話 伝説	
Sar	C10-10-A	20-A 四社話 Mitouso by pari	表示の音、単語読み上げ
Sar	C10-10-B	20-B 四社話 発音 by pari	歌
Sar	C02-06-A	29-A 四社パオセシ Iawaririili	
Sar	C02-06-B	四社パオセシ Iawaririili	浅井の音で「四社藩クアラ

浅井自解資料の整理 264

圖 5 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淺井資料目錄中的 1936 年賽夏巴斯達隘祭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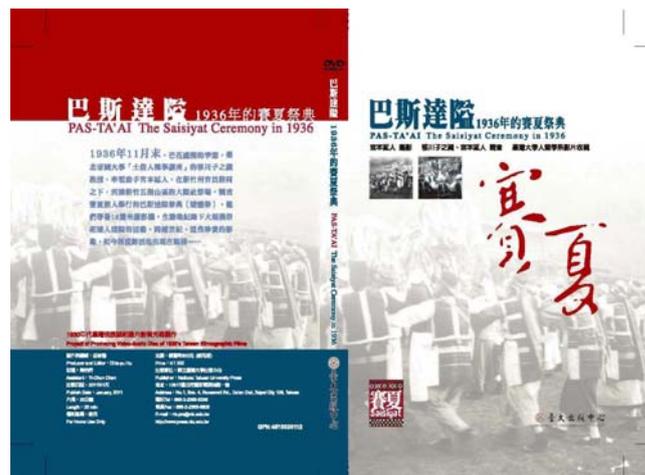


圖 6 2011 年臺大出版社發行的《巴斯達隘：1936 年的賽夏祭典》（胡家瑜，2011）

結論：跨國收藏的連結與地方記憶的拼接

受到後現代和後殖民風潮的影響，近來台灣各個相關研究領域，開始重新思考過去從科學實證角度來處理異文化資料所隱含的問題。當大家重新檢視博物館藏品取得的過程時，發現過去很多藏品資料的調查和採集，經常是在客觀中立的「科學知識發展」或「搶救和保存」名義下進行，刻意地忽略、掩蓋或移轉其中糾纏的權力關係，以及立場和觀點的差異。以收藏和再現異文化器物為主要範疇的民族學博物館，尤其成為當代關注的焦點，以及要求深刻檢討和轉型的對象。民族學藏品疊壓著不同層次的權力矛盾和價值衝突，一方面是因為藏品流動的過程，幾乎都跨越國家或文化的邊界，因此經常涉及強勢權力與地方社會的角力，或是夾雜著文物來源群體的傷痛歷史。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藏品脫離原有社會移動至都會博物館的過程，也是文物資料離散、脈絡訊息失落和價值意義轉變的過程，因此藏品的保存、詮釋和再現，也常成為不同社群或團體間競賽、紛爭和衝突的引發點¹⁷。

本文前面所討論的二個案例，可以反映出臺灣民族學收藏跨國流動的複雜歷史過程、背後交疊潛藏的帝國身影和殖民勢力，以及當代可能賦予的不同作用。檢視這些藏品資料的採集、離散和聚集等動態流動軌跡，可以讓我們更深刻理解文物資料保存的意義、挪用他者圖像的矛盾、再現藏品激發的具體力量、和記憶政治運作的動力等。從其中跨界互動過程可知，現今保存在博物館中的民族學藏品，經歷複雜的生命歷程，現今仍然可以是跨越時空延伸與連結過去的具體材料。這些物質材料，不僅承載著過去的歷史文化訊息，也是當代社會激發和建構過去記憶的媒介。

Paul Connerton 在《社會如何記憶》(*How Societies Remember*)一書中，認為傳承與維持社會記憶的載體，除了文字紀錄之外，更需要關注口語、物質實體和儀式行動等其他媒介，不同形式的載體涉及不同層面的記憶運作機制；同時，他也強調過去和記憶並不是靜態不變的，而是流動變化的，是在

¹⁷ 相關討論見李尚仁，2003；李子寧，1997；李正亮，2006。

實際生活行動中因應當代需求而不斷建構的(Connerton, 1989)。另外，Maurice Bloch 也在《內部與外部記憶》(*Internal and External Memory*)一文中，從認知和實踐的觀點討論動態的記憶系統，並且提出「內部記憶」(internal memory)和「外部記憶」(external memory)二種不同理解和實踐歷史的概念(Bloch, 1998)。前述的例子顯示，民族學藏品做為保存在博物館的物質實體，是一種外部記憶的材料，但也可以轉化為當代不同文化群體實踐行動中的內部記憶¹⁸。但是，由前面的討論可知，對於不同群體的行動者而言，針對同樣的過去藏品資料，記憶重塑和拼接的偏重方向可能並不相同；因為不同群體的內部記憶，不僅是在群體成員的過去認知經驗中衍生並在社會生活中實踐，也因應不同情境和政經利益的變化，可能出現相互競爭或矛盾的關係。甚至，在變動的時空脈絡下，我群和他者的邊界也不斷的流動和改變。

總結而言，早期在帝國或殖民勢力影響下累積和輾轉保存的過去民族學藏品資料，伴隨著複雜糾結的跨界互動和不平等關係，是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特殊類型物質研究材料。這些收藏，在當代可以轉變為具有多重意義的珍貴文化資源或物質記憶載體，也可以作為連結部落、都會和國際的媒介。雖然許多跨界流動而離散的民族學藏品，背後隱含有複雜的權力問題或多重的聲音爭議，但重要的不是刻意忽略問題或掩蓋爭議，也不可能期待納入所有不同的聲音或視為同等重要。簡言之，重新連結與運用過去跨越文化邊界採集得來的民族學藏品時，必然面對不同社群關注重心或記憶焦點的分歧差異。面對無法避免的層層糾結矛盾或立場觀點不同，我們可能更加需要思考和判斷的是記憶的主觀性和文化傳承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平衡權力和資源的落差、如何積極地面對文化傳承者的意願和內部動力、如何理解並重視地方的利益、情感和記憶，讓文物生命的延伸與原本文化的根源能夠有更密切的連結，應該是未來重新接合不同機構和不同類型民族學藏品資料時，亟需發展的重要課題。

¹⁸ 參考 Bloch, 1998。

參考文獻

- 小川尙義、淺井惠倫，1935。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東京：刀江書院。
- 土田滋，2005。淺井音源資料の整理。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主編），小川尙義、淺井惠倫臺灣資料研究，頁：247-269。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
- 三尾裕子，2005。前言—小川・淺井と AA 研。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主編），小川尙義、淺井惠倫臺灣資料研究，頁：5-10。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
- 伊能嘉矩，1910。日英博に於ける台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6（297）：125。
- 李子寧，1997。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台灣省立博物館年刊，40：241-270。
- 李尚仁，2003。收藏的帝國：博物館作為科學研究機構的歷史，博物館學季刊，17（2）：37-43。
- 李政亮，2006。帝國、殖民與展示：以1903年日本勸業博覽會「學術人類館事件」為例，博物館學季刊，20（3）：31-46。
- 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2005。小川尙義、淺井惠倫臺灣資料研究。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
- 胡家瑜，1996。從民族學研究到異文化展示—由臺大人類學系『原住民物質文化』特展談起，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1：148-171。
- 胡家瑜，2005。博覽會與台灣原住民：殖民時期的展示政治與「他者」意象，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2：3-39。
- 胡家瑜，2007。博物館、人類學與原住民展示—歷史過程中文化再現場域的轉形變化，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6：94-124。
- 胡家瑜，2009。紀錄片的返鄉之旅。人類學視界，3：8-11。
- 胡家瑜，2011。巴斯達隘：1936年的賽夏祭典（光碟與簡介手冊）。台北：台大出版社。

- 宮岡真央子，2005。動畫資料目錄。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主編），小川尚義、淺井惠倫臺灣資料研究，頁：274-282。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
-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1935。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第一冊、第二冊。東京：刀江書院。
- 淺井惠倫，1937。高砂族音樂のレコード吹込，南方土俗，3：56。
- 陳金田譯，1998-1999。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第二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3。批判、反省與實踐：百年來臺灣博物館的原住民文化展現論壇。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 幣原坦，1938。南方文化の建設へ。東京：富山房。
- 鈴木作太郎，1932。臺灣の蕃族研究。台北：台灣史籍刊行會。
- 趙正貴著，2009。賽夏族的歷史文化—傳統與變遷新竹文獻。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 臺灣日日新報，1912，9月26日—11月3日，臺灣日日新報社。
- Ames, M. M., 1992. *Cannibal Tours and Glass Boxes: The Anthropology of Museums*. Vancouver: UBC Press.
- Anico, M. & Peralta, E., 2009. *Heritage and Identity: Engagement and Demiss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London & NY : Routledge.
- Bloch, M., 1998. Internal and external memory: different ways of being in history. *In*: M. Bloch. (Ed.), *How We Think They Think: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Cognition, Memory, and Literacy*, pp. 67-84. Colorado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 Boswell, D. & Jessica E. (Eds.), 1999. *Representing the Nation: A Reader, Histories, Heritage and Museums*. London: Routledge.
- Bouquet, M., 2001. *Academic Anthropology and the Museum: Back to the Future*. Oxford: Berghahn Books.
- Cannizzo, J., 1998. Gathering souls and objects: missionary collections. *In*: T. Barringer & F. Tom (Eds.), *Colonialism and the Object: Empire,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Museum*, pp. 153-16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lifford, J.,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 Commission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1911. *Official Report of 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 1910 at the Great White City, Shepherd's Bush, London*. London: Unwin Brothers, Ltd.
- Connerton, P.,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pp.72-10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ane, S. A. (Ed.), 2000. *Museums and Memor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urst, H. J., 1989. Material culture research and the curation process. *In*: S. M. Pearce (Ed.), *Museum Studies in Material Culture*, pp. 97-110.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Gonzalez, R. J., Laura N. and C. J. O., 2001. Towards an ethnography of museum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us. *In*: M. Bouquet, *Academic Anthropology and the Museum: Back to the Future*. New York, pp. 142-134. Oxford: Berghahn Books.
- Hallam, E., 2000. Texts, objects and 'otherness': problems of historical process. *In*: E. Hallam & V. S. Brian (Eds.), *Cultural Encounters: Representing 'Otherness'*, pp. 260-28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enare, A., 2005. *Museums, Anthropology and Imperial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shii, S., 1916. *The island of Formosa primitive inhabitants*. Paper Read at a Joint Meeting of the China Society and the Japan Society, held at Caxton Hall, on Thursday, February 24, 1916, London: MCMXVI.
- Kavanagh, G., 2000. *Dream Spaces: Memory and the Museum*.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Keurs, P. 1999. Things of the past? museums and ethnographic objects. *Journal des Africanistes*, 69(1): 67-80.
- Shelton, A. A., 1997. The future of museum ethnography. *Journal of Museum Ethnography*, 9: 33-48.
- Shelton, A. A., 2000. Museum ethnography: an imperil science. *In*: E. Hallam & V. S. Brian (Eds.), *Cultural Encounters: Representing 'Otherness'*, pp. 155-19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turtevant, W. C., 1966. Ethnological collections and curatorial records, *Museum News*, 44 (7): 16-19.

Tunbridge, J. E. & Ashworth, G. J., 1996.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 Chichester, New York etc.: John Wiley & Sons.